

# 一群穿着长衫戴着眼镜的苦行僧

□禾刀



2021年9月  
《晏阳初》  
苗勇  
东方出版社

1926年冬,中国平民教育协会准备离开北平奔赴两百多公里外的河北定县。在火车站,面对一个个行色匆匆的平教人,有着民国“副刊大王”之称的孙伏园揶揄大家是“一群穿着长衫戴着眼镜的苦行僧”。虽然平教人大多才高八斗,其中许多人还有着相对较好的工作环境,但他们一个个放下身家,这才奠定了后来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平民教育“定县模式”。

晏阳初为“民国乡建三杰”之一,他的平教事业经历了一战中国民工群体的成功试验,后在国内播种发芽,再又输向国际的

边试验边发展路线。他毕生推崇的平教事业受到国内外多位政治要人的高度评价,一些知名人士也纷纷采访,像《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埃德加·斯诺称他是“一位有独创的教育家”。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的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则称晏阳初“在世界黑暗之处点燃了一盏明灯”。

家乡人为家乡人立传,这是中国乡土文化的特色之一。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在这本45万字的文学传记中,作为晏阳初地道巴中老乡的苗勇,充分发挥了自己从小生活在巴中,对家乡风土人情熟稔的专长,成功再现了晏阳初童年和青少年的成长经历。特别是跋山涉水求学那段,融入当地“背二哥”文化后,意趣横生。

一个积极上进的人,常常会像一块磁铁,吸引许多“贵人”热情相助。晏阳初并不宽裕的家道不足以支撑他的漫漫求学路,但他的勤学奋进吸引了一路上的支持者。从巴中到成都,再到香港,再到耶鲁大学,每一次都是山穷水尽,每一次又都柳暗花明。挫折从来没有压倒过他,后来从事平教事业同样如此,面对资金、人才、场地、百姓起初的抵触和一些人的质疑等种种看似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几乎每次晏阳初都会以其非凡的个人毅力也是魅力,克服一个

又一个困难。

河北定县平民教育无疑是晏阳初毕生事业的一个分水岭。殊不知,当初平民教育协会从条件相对较好的北平来到定县时,才真正发现当地不仅一穷二白,而且传统和封建思维浓厚,不少百姓对新知识存在着本能的抵触。由于条件太过艰苦,“几个月下来,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定县。”晏阳初充分认识到中国农民有“愚、贫、弱、私”四大弊病,为对症下药,除了基本的文化教育外,他们还从生计、卫生、公民等方面入手,对乡村进行全方位改造。

具体到晏阳初个人,他所面临的困难远不止这些,一些政治势力甚至想方设法拉拢他,如东北虎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曾多次想方设法邀请他。面对给待遇给条件,晏阳初心不改。也有一些人质疑平民教育。如在定县平民教育试验如火如荼之时,《世界日报》《每周评论》均曾发文质疑,但真金不怕火炼,晏阳初坚信破除质疑的最好办法,就是以最勤恳和最努力的方式,慢慢化解偏见的坚冰。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之所以成就斐然,这与他甫一开始的高起点密不可分。他身边会聚的要么是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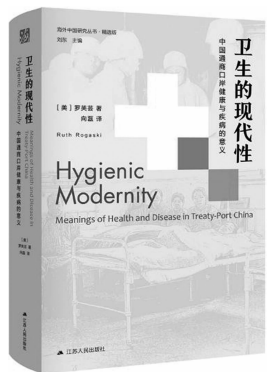
熊佛西、瞿菊农、冯锐、陈志潜、汤茂如、李景汉、陈筑山等人皆是美日等国留学归来的博士、硕士;要么是国内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像孙伏园有着民国“副刊大王”之称,姚寻源当时是北平协和医学院高才生,而原国务总理熊希龄的夫人熊朱其慧因被晏阳初倡导的平教事业所打动,辞去全国妇女联合会会长与全国红十字会会长之职,全身心投入平民教育事业。

值得一提的是,这么多优秀人才之所以会聚到晏阳初身边,肯定不是因为钱,当然也不会因为单单想尝尝艰难困苦的味道,毕竟定县平教活动一搞几年,还得拖家带口。如果不是日本侵略,定县平教活动并没有明确的结束计划。从这一角度讲,孙伏园的自嘲再形象不过。“苦行僧”也绝不仅仅因为艰苦,而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支撑。平教人正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才会坚定地呆在贫穷落后的定县。

当然,作为一部书写晏阳初传记的作品,不知是否限于素材等原因,与前半部分有血有肉、常常令读者心潮澎湃相比,后半部分变成了大篇幅的“文摘”或“言摘”,与前半部分力倡的文学式书写风格有明显差异,使得文学传记有些名不副实,这也成为本书的一大缺憾。

# 近代卫生史与中国的现代性

□林颐



2021年10月  
《卫生的现代性》  
罗芙蓉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先后获得“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等奖项。该书是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罗芙蓉在多年研究中国清代与近代历史,以及东亚的近代医学史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罗芙蓉将中国近代卫生史研究置于“现代性”的命题下去思考这一研究的宏观背景与深层根源,为此,她选择了天津作为落脚点,不仅具有内在合理性,而且撕开表

层深入了肌理。

罗芙蓉说,她最初选择天津作为研究点,是因为它是中国许多最重要的医学“第一”之乡。天津是中国第一个拥有中国人自己管理的医疗市政机构(1902年)的城市,这是新政时期由袁世凯创办的。天津也拥有中国第一个由政府创办的西式医学院——北洋医学堂,它是1880年由英国传教士建立的,1888年被清政府接管。而且,使这些医学“第一”更为有趣的,是其发生时中外交通的特殊背景。

罗芙蓉的研究放置在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大背景里。晚清以降,中西竞争激烈,“强种关怀”成为建构民族国家的取向之一。该书讲述了在形塑中国人的强种认知和将之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医学卫生书籍及其所打造的阅读文化在其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格致学院的创始人、英国学者傅兰雅翻译了一批卫生译著,用化学解释人体如何与环境进行互动,对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以及中医理论造成了很大冲击。中国学者梁启超、郑观应等人成为这些译著的拥趸读者和积极的传播者。另外,编译自日本的大量生殖医学书籍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追慕和想象的标本。这些书籍蔚然大流的流行,是清末民初“强种关怀”的表

现。

以中国卫生的“现代性”而言,无论是医学知识的认知或医疗卫生制度本身,都引发自西方(包括日本)的知识和制度。“卫生”一词,最初就是日语词汇。这些知识与制度本质上是十九世纪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文化基础。罗芙蓉陈述了欧洲的卫生历史及其世界范围的扩展。传统社会起初难以接受西方科技与制度,又有在其中寻找救国良策的渴求。卫生,正是两种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相撞发展出来的新的“混合体”之一。

罗芙蓉认为,天津可以被描述为超殖民地,她试图让人们关注多种殖民主义分割一个城市空间时所产生的潜在内涵。在她看来,天津的地位将中国的城市居民置于不同帝国主义列强的凝视,有时是控制之下。这一境遇带给中国人一个观察多种不同的城市现代化模式及殖民地意识形态的视角。多种帝国主义的存在也影响了帝国主义者本身,每个租界都必须针对其他列强在地域上表述并确定其身份。她的研究考察了在这些帝国表述中,健康及卫生如何成为其中的一种重要策略。

天津,恰巧处于碰撞的一个关键位置。天津的卫生进程与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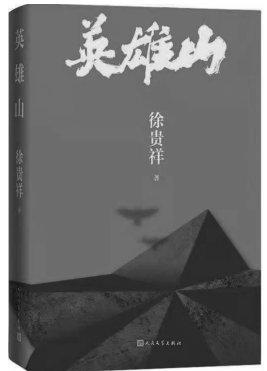
密相连。天津是义和团事件中后果最严重、毁坏最大的城市,列强进驻天津之后需要防止各种疾病暴发,由此催生了清廷卫生官署的成立。现代卫生要求城市景观进行功能性分离区划,特别是饮用水、下水道、粪便等的处理。在1937-1945年沦陷期间,天津被正式纳入日本“战时帝国”体系,这是一段屈辱的历史,不过,日方对传染病和细菌的控制能力,的确增加了天津的卫生现代性经验。20世纪50年代的爱国卫生运动,让卫生之道变得本土化,一个独立自主、拥有卫生现代性的国家理想,从此成为人民的普遍信念。

在结语部分,罗芙蓉总结强调了以下几点:卫生是形成中国精英现代理想想象的工具性话语;大量关于中国缺陷和西方优越的修辞都围绕着现代生物医学、科学和身体展开;日本为中国观察者提供了一种非白人的现代性模式,一种由亚洲人创造的对欧洲道路的模仿。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推动卫生参与民族国家的构建。

这部作品高屋建瓴,思维广阔,既有细致的局部分析,又拥有国际化的比较视野,对于了解天津城市史、疾病与健康的意义,中国近现代史的叙事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英雄主义精神的文学赞歌

□陈华文



2021年9月  
《英雄山》  
徐贵祥  
人民文学出版社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徐贵祥在军事题材创作领域成就斐然,长篇小说《英雄山》是他今年推出的又一军事文学力作。徐贵祥的创作和军事题材文学结缘,与其成长历程紧密相连。年轻时,他便离开家乡皖西参军入伍至今。徐贵祥也是一位经受过战争洗礼的作家,步入文坛的首部作品,写的就是牺牲在自己身边的战斗英雄。文学创作

中,对战争的思考、对英雄的书写,他的文学版图一直都没有离开家乡皖西,就如同莫言之于高密、贾平凹之于陕南、王安忆之于上海、张炜之于胶东半岛。

《英雄山》的故事背景主要发生在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故事场景设定于鄂豫皖地区,这里也是徐贵祥创作的“文学现场”。《英雄山》由《穿插》《突围》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穿插》,主人公为红军侦察参谋凌云峰,他擅长打“穿插”,以少量兵力迂回到敌人侧翼或后方作战,屡建功勋。后来,他所在的军队经过惨烈战斗,几乎全军覆没,他本人也不幸与主力部队失散。在前往陕北寻找队伍的途中,抗日战争爆发,他阴差阳错进入了曾经的敌人、地方军阀谢谷的部队。在国共合作共御日本侵略者的时代大背景下,凌云峰做出了自己的艰难抉择。小说的下部《突围》,则从“反面”揭开了很多谜底,包括凌云峰“复活”的真相。国民党军校“特殊人才”易晓岚在接受了培训后,更名改姓,冒充红军团长凌云峰潜入红军队伍。此前,易晓岚对凌云峰的个人历史做了充分了解,他渐渐开始敬仰凌云峰

并冒充他。在执行任务的关键时刻,易晓岚选择站在了正义的一边,并从此开始了脱胎换骨的改变。

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不同情境下不同程度的信仰危机,有人动摇,有人沦沉,但信仰和意志刚强的革命军人,在困境中磨炼,最终成为英雄。整部小说,如其说是讲述战争故事,还不如说是探究人的命运、人性本色,彰显共产党人、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的英勇无畏与顽强崇高的革命信念和牺牲精神。小说的故事情节精彩曲折,其战争场面众多,既展现了战场上的瞬息万变,同时也探究英雄人物的内心世界、成长之路和情感历程,这让残酷的战争多了几分铁骨柔情。小说中对信仰的拷问和探寻,没有一味地唱高调,也绝非一味地追求惊悚和刺激,更不是苍白的坐而论道,而是通过人物自然而然的命运走向,经叙事逻辑逐渐发展,最后水到渠成。

作为军旅作家的徐贵祥,对战争的文学表达,有其立场和态度:写战争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和平,理智和审慎地对待战争,用智慧和人格化解战争,也许就是最好的战争。

阅读长篇小说《英雄山》,思想启发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文学创作中要处理好战争与人的关系。作为军事题材的小说作品,很多作家时常不自觉地陷入硝烟弥漫的战争场景书写中,并以此津津乐道。战争场景的生动描写固然不可或缺,可作为战争中的人则是主角。把人的形象刻画好,把人的命运走向呈现好,这是小说创作之根本。战争与人不是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创作中不能顾此失彼,这也考验作家的文学才能和小说的宏观驾驭能力。其次是文学创作要有创新创造的勇气。徐贵祥在系列军事题材小说创作中,无论是故事构建还是人物塑造,从来都不重复自己,更不走回头路,他总是在寻求新的叙事模式和新的表达方式。最后文学创作主题思想要旗帜鲜明。徐贵祥在《英雄山》中,就是主题鲜明地弘扬英雄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也是我们的底气之所在。中国历来有文以载道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文学魅力,面向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唯有文学主题思想鲜明有力,作品才能引导人、鼓舞人和激发人。